

您对当前生活质量满意吗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当这句上海世博会的最强音奏响时,唤醒的也许不仅仅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城市精神,更是中国人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关注和审视。但最近进行的一项网络问卷调查显示,七成中国城市网民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并不满意。

重心从经济发展转向生活质量

现代人栖居于城市,城市生活质量的高低被视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本次调查中,有七成以上的城市网民不满意当前的生活质量,只有一成的网民认为满意。另一一成表示很难说。

在当前的发达国家,人们对经济成长的关心已经被对生活质量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关心所取代。从“田园城市”到“新城市主义”以及“精明增长”,从大伦敦、大温哥华到新泽西州发展与重建规划,发达国家的城市和区域规划理论和实践都将提升生活质量作为主要目标。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当前中国城市的生活质量似乎并不尽如人意,而与此相关,调查中近一半的网民认为自己患有“城市焦虑症”,两成人很难确定,只有三成的人表示自己没有问题。对于其原因,“房价、物价飞涨”被网民列为首选,随后按投票顺序依次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自然环境恶化”、“社会保障不健全”、“城市规划布局杂乱”、“交通效率低下”、“就业压力大”、“城市安全指数低”和“城市化过快”等。

北京大学城市和区域规划系主任吕斌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当前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城市病问题归根结底是城市化路径问题——城市化不仅仅是追求量的扩张,更

重要的是对质量的提升,这需要一个健康的城市化过程。

吕斌认为,这样一个健康的城市化必须考虑四种承载能力:一是大中城市相互协调的能力;二是工作岗位的提供能力;三是城市生态的承载能力;四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城市和谐度最受青睐

在本次调查中,网民分别从个人角度和城市角度选择决定城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从个人角度来看,“有更多时间去享受生活”成为网民的首选,其后按投票顺序依次是“稳定的住房”、“较高的薪金”、“美满的婚姻”、“有固定的朋友圈和社交空间”、“能方便购买和使用城市科技等设施”。

而从城市角度来看,“社会和谐安宁”最受网民青睐,往后依次是“公共服务便利”、“生活保障充分”、“区域治安水平普遍提高”、“各种社会关系比较和谐稳定”、“城市发展方式是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建设和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等。

吕斌指出,和谐的需要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一种共识,这种和谐体现在各种社会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和谐、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等方面,应该贯穿城市化过程中的各个细节。

在城市和谐的认知基础上,网民将最能提供优质城市生活的选票投给“昆明、青岛等旅游城市”,占四成比例,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只收获一成选票。

吕斌认为,大城市解决协调发展问题,最好的空间单元就是城市圈,但不管是城市圈的这种协调也好,城乡统筹也好,区域统筹也好,都需要考虑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

里边怎么样去实现资源的各方面的优化。

就在近期,国内首个以生活质量提升而不是区域发展为核心诉求的跨界合作规划——《粤港澳共建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蓝图绘就。根据《专项规划》对“优质生活圈”的描绘,这个生活圈应该是生态系统安全可靠,自然环境健康洁净,经济发展低碳、可持续,居民能够获得多样就业岗位保证体面的生活,空间环境舒适宜居,交通系统绿色、高效,社会和谐安宁,公共服务便利……一些专家认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刻,这一规划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描绘了中国城市未来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文化多元的新的努力方向。

绿色城市布局渐受重视

在被城市规划界奉为范本的美国新泽西州的州城规划中,人们可以读到规划者关于城市规划理念的数个关键词:“保护耕地和开放空间”、“土地的有效建设”、“让下一代能够长期享用城市中的田野、森林和牧场”……

在网上调查中,网民认为影响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是“无力负担住房”,这一条得到两成的选票。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开敞空间的消失”、“城市的扩张所带来的郊区自然面貌的改变”也受到网民相当的重视,投票率紧随其后,与位于首位的“无力负担住房”投票率接近。

眼下,大量城市科技和创新正在上海世博会上亮相,历届世博会展示的新科技和创造也都成为之后城市改革的重要动力。但在本次调查中,近一半的网民对于城市科技和创新改善城市生活质量感到信心不足。看来,如何畅通科技改变城市的通道,仍是未来有关部门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摘自《环球》

只留7只的香蕉

通常情况下,一串香蕉一般有11只~12只。但是,广西有个叫卢义贞的人,非要在香蕉开始挂果的时候,把多出的割掉,只保留7只。

人们虽然想不通,但对所有香蕉进行了“手术”。奇怪的是,别人的香蕉还没成熟时,他的香蕉已

经开始收获了。而且出人意料的是,每只香蕉长得更均匀、更壮硕,整体重量与原来几无差别。由于别人的香蕉还没上市,他的香蕉迅速占领了市场,卖了个好价钱。

每串香蕉为什么只留7只?他说出了其中的奥秘。香蕉每减少一只,就能早上市一个星期,那么,只

留7只,就能早上市一个月。而且,在一般香蕉收获的季节,如果遭遇冰冻,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早上市一个月,不但抢在了早产到来之前,还是市场上独一份,怎能不卖出好价钱?

平时,我们常说:没有舍就没有得。很多人也都懂得这个道理,可往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舍,许多人是做不到的,只有具备了舍的胸怀、舍的胆识和舍的底气的人才能做到。

摘自《宿迁晚报》

我在日本受到三次文化震撼

房宁

去年夏天,第一次踏上东邻日本的土地,就感受到三次“文化震撼”。

到日本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请在日本工作的弟弟陪我上了住友三角阁的顶层,这里是东京观赏夜景的最佳地点。看着无数灯火通明的办公大楼,我问弟弟,为什么这么晚了,办公楼还都亮着灯,弟弟回答说一般公司职员都工作到很晚。

有一天晚上我去弟弟公司找他,推开办公室的门却吓了一跳,员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大半屋子的人都还在忙碌着,而这时已经下班一个小时了。弟弟说,日本人就这样,其实他们也没干什么,只是干活儿干得意犹未尽,还想再找点什么事干干。

晚上乘轻轨火车返回东京郊外的住所时,已是深夜了,而车厢里竟

挤得满满的。望着这群满脸倦意、默然站立的日本“上班族”,我内心震动了——我们的近邻竟然是这样工作的!

去日本前听人说日本人生活还是比较朴素的,“吃得少,干得多”,我到日本访问时就留意观察。日本人在馆店里吃饭一般多采取“定食”的方式,与我们的“份饭”类似。一份“定食”种类并不少,高档的“定食”往往有十几种菜,但每种数量却少得可怜,有的菜竟是一颗青梅或一块鸡蛋大小的没油没盐的生豆腐。东京的“吉野家”比北京“吉野家”一份“定食”的数量要少得多——比茶杯大一点的一小碗米饭,刚刚铺满盘底的一小碟涮牛肉片,一小碗酱油,外加一小撮咸菜,这就是日本一个中年男子的午餐,真有些不可思议。

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与弟弟

卢森堡人的苦恼

卢森堡处于欧洲的“十字路口”,夹在德、法、比三国当中,市民出于国家经济的对外依赖性,每人至少要学会3种语言,首都卢森堡市更被誉为“人人都是语言学家的城市”。

当婴儿牙牙学语时,妈妈首先教会他们说本国的卢森堡方言,这是国人日常交谈的口语。进入幼儿园后开始学德、法两种官方语言,其中德语更为迫切,因为德语是教堂宣教的语言,不懂德语就不能跟着神父念圣经唱圣诗。小学同时用德、法两种语言授课,中学修第三门外语,如英语、拉丁语等。因为国内没有办大学,要深造必须出国留学。

报纸用德文出版,一般杂志用德、法文出版,学术杂志用法文,广播用德、法语,电视用法语,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并无法律之规定。奇怪的是,德文报中偶尔也会有一篇法文评论,插一首卢森堡诗歌。招牌和菜单肯定用法文,各种票证、单据也是法文。议会辩论语言只许用法、卢两种。法庭审讯犯人使用卢语,宣判用英语,判决书用德文打印。

摘自《教师博览》

一家子在一起,你会看到父亲在读德文报,儿子在念法文书,女儿在唱英文歌,母亲用卢语唠叨,而且彼此都听得懂对方的语言。

外国人非常赞赏这种高超的语言水平。可是,卢森堡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埋怨自己生卢森堡,为了谋职和生存,将大半精力都消耗在三四种语言的学习运用上,满脑子的单词,大大干扰了文学创作和灵感。在这块国土上,金融家、企业家、演说家出了一些,但大家豪从来没有出现过。

摘自《羊城晚报》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wbw@1616@sina.com

波兰总统：一颗沉甸甸的“土豆”

当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健在的时候,国际间许多政治家、政论家和媒体人将他戏称为“土豆”,因为这位身躯矮小的总统似乎总试图发出一些与自己身材不相称——或者说干脆说,试图让波兰发出些与身材不相称的声音;当美国人自己从东欧导弹防御计划上却步时,他却挥舞起“坚定不移”的拳头;当大半个欧盟都在低声下气地在格俄战争中谋求缓靖时,他却毫不掩饰地公开支持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为了波兰的“能源安全”,他毫不犹豫地将对俄天然气管道比作二战前出卖波兰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最终让波兰冒上同时得罪俄、德两个大国的风险……直到2010年4月10日,他和包括央行行长、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副外长在内,总计96人一并丧生,人们骤然回头,才发现“土豆”也有其沉甸甸的一面。

从12岁因主演《两个偷月亮的男孩》一举成名,到加入独立工会运动,成为团结工会要员,再到当上华沙市长、波兰总统,他仿佛都是孪生哥哥雅罗斯瓦夫的影子;电影里哥哥是A角,自己是B角;搞工运、入阁,成立新党,哥哥是主心骨,他则是亦步亦趋的配合者。尽管他的官运似

乎远比哥哥亨通,但根据波兰第三共和国的政治默契,总统只不过是礼仪性角色,实权掌握在总理手中,因此当2007年10月,雅罗斯瓦夫在大选中失利,丧失总理职位后,人们曾普遍预言,“土豆”将变得更加无足轻重,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政治人物。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本应“礼仪性存在”的卡钦斯基频频挥舞起“礼仪性”的总统否决权。作为资深右翼政治活动家,卡钦斯基既有“草根派”的阅历(上过街,坐过牢,搞过罢工鼓动),又有“学院派”的底气(在格但斯克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法学院任教多年,许多阁员都是他以前的门生);作为一个在政坛摸爬滚打多年的政坛老手,一个“后华约时代”的典型人物,他近乎罕见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切贪腐丑闻仿佛都与他无关,恰恰相反,他在任监察院长、司法部长时,都掀起过反腐风暴,甚至不惜为此挂冠而去。

更重要的是,卡钦斯基所发出的声音,未必是最明智、最符合自己和波兰利益的,但往往是波兰民众最愿意听的。

正因如此,不论是做议员、检察长、华沙市长或波兰总统,卡钦斯基

率性妄为表现的背后,是有的放矢地迎合波兰社会和民众的种种言行。他经常对俄罗斯摆出敌视面孔,支持格鲁吉亚,支持乌克兰“橙色联盟”,却在政府已表态承认科索沃独立之后,在贝尔格莱德声称“个人对此是不同意的”;他在政治上主张上接近欧盟,却经常发表反对欧盟一体化的言论;他经常表达对美国的溢美之词,却不顾许多美国“老朋友”的刺耳反弹,毫不留情地打压同性恋者,反对赦免囚犯,甚至多次主张恢复死刑……

不论他或波兰,在列强林立的中东欧“十字路口”,都注定只有“土豆”的分量。然而任何政治家首先是本国的政治家,卡钦斯基所要获得的,其实只是波兰人的认同,从这点上他是成功者,他的支持率一直高过总理兼政敌图斯克。

波兰总统是礼仪性、象征性的职务,这让他无需拿出内政方面的“硬业绩”,而只需扮演一个“负责任的批评者”;至于外交方面,波兰的国力有目共睹,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与生俱来的悲情主义,让“土豆总统”的每一次国际性挫折都能激发更强的民族自尊心,而难得的外交收获(如几天前刚让普京对“卡廷事件”作出“正确表态”),则更能让“土豆”在国民眼中熠熠生辉。

摘自《意味》

纸生风,令人叫绝。只见画面上枯松倒挂,怪石嶙峋,一只斑斓猛虎迎风长啸,神态栩栩如生,令人望而生畏,风格与其迥异。张善孖看后,暗暗称奇,遂在画上补景题诗。恰在此时,一位日本客人来访,看到这幅画不禁来了兴致,执意要买,起初张善孖还执意推辞,但听这位日本人说道:“虎公,此画一出,世人就会知道你八弟还会画虎,岂不更好?”张善孖一心为弟扬名,便把画卖给了日本人,醉酒中的张大千全然不知。

很快,消息不胫而走,满城争说“大千虎”,每日登门求画者络绎不绝。大千幡然醒悟,贬己扬己,小人所也为!于是顺手抓过纸笔,写下了这样一幅字:

大千受贫和苦,
黄金千两不画虎!

自此,大千立下两戒:一戒画虎,二戒饮酒。直到抗战胜利,大千才开了平生唯一一次酒戒,虎,却是再也不画了!

摘自《文萃》

5斤橘子救了潘石屹

上世纪90年代的海南,是个疯狂激情下的疯狂地方。

“1989年我去了海南。海南特好!整个气氛都特别自由,周围大部分也都是北方人,大家都是闯天下的,什么都能谈得来。那时候挺穷的,可我穷,还有比我更穷的!”这是现任SOHO中国董事长的潘石屹初到海南的感受。

1989年,只有26岁的潘石屹无家无业,刚刚从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辞职两年。没有光头,没有黑框眼镜,更没有SOHO中国。

当年的他,只是个砖厂的厂长。潘石屹是跟着一位老板来到海南的,他的老板承包了一个砖厂,让他当厂长,负责300个民工的生产生活问题。他乐在其中,觉得“至少自己可以做主,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一支队伍”。1990年春节前后,海南岛刮了一次特大的台风,经济一片萧条。砖没人要,大家的生活也都相当困顿,甚至长时间挨饿。不过,这一切都没把潘石屹从海南吓走。

1990年,潘石屹认识了冯仑和王功权等人,并和易小迪、张民耕等人在海南成立了万通的前身——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

公司(简称“农高投”),他们瞅准机会,也加入了当时热火朝天的炒房大军中。

“一开始都不敢相信,不敢签。在1楼签了房产买卖合同,到6楼加价就卖了。现在想想都害怕。”潘石屹这样回忆他刚加入炒房大军时的情景。不过,虽然战战兢兢,潘石屹也很快赚到他人生的第一个100万。

而且,更值得庆幸的是,他并没有因为赚钱容易而变得失去理智。当很多人在将一个大大坑炒成一座大厦,甚至一个大坑被当做大厦转手十几次也无人知晓它只是一个大大坑时,他竟然锲而不舍地要求去海口市规划局查看房地产项目资料。

这,正是他逃生的关键所在。1992年年底的一天,潘石屹去海口市规划局了解一个项目的产权问题,可是在规划局却吃了闭门羹。规划局的一位小伙子说“这是保密文件,你不能查。”潘石屹不想空手而归,只能在规划局门口徘徊。这时,一位也来规划局办事的熟人给他支了一招,说,“你啊,得买一斤橘子!”

他买了5斤橘子送到规划局,小伙子见了,就把一摞资料给了

他:“查吧。”这一查,让潘石屹吓了一大跳。他发现,海口市整个报建面积除以该市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人均面积达到50多平方米,而当时北京的人均面积才不过7平方米。在潘石屹看来,这个数字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海南房地产行业要出事了。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天要塌下来了!”潘石屹说,“没有任何需求支持的供给,这不就是泡沫吗?”由此,5斤橘子给了潘石屹一个逃生的证据。之后,他带着在海南赚得的第一个100万及时撤离,来到北京寻求发展,成功躲过了半年后海南房地产的泡沫破裂。也正是因此,才有了现在SOHO中国的版图,有了现在的潘石屹。

潘石屹从海南全身而退之后,在发展上一向是小心翼翼。SOHO中国目前只在北京、上海的繁华地段做项目。他说“房地产业不应该是一棵参天大树,它应该是爬山虎:只有工业、农业、旅游等各行业发展起来,房地产才能发展起来。”潘石屹直言,10多年前,海南房地产就是因为没有实体经济支撑,所以成为泡沫。现在海南被定为国际旅游岛,如果先发展旅游业,再发展房地产业;或者旅游业与房地产业同步,海南的房地产业就不会是泡沫。如果没有别的行业支撑,而只发展房地产行业,那它还是泡沫。

摘自《中国青年报》

黄金千两不画虎

张大千自9岁起就开始学书画,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最终蜚声中外画坛。1957年,被美国纽约世界美术家协会推举为当代第一大画家。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大画家,却不画虎,个中原因,还得从他的二哥张善孖说起。

张善孖,号虎痴,长张大千17岁。由于他们的大哥离世比较早,所以张善孖在家里的地位就相当于兄弟中的老大。张善孖承家学,随母学画,而年纪尚小的张大千就跟在哥哥的后面东涂西打,以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张大千的艺术才华很快就显露出来,18岁那年,他考入了日本的京都艺专染织系,课余时间习书法和绘画,在二哥的悉心引导和帮助下,张大千进步很快。回国后,大千居住

上海,一边在学校教绘画,一边在张善孖的带领下拜师访友,结交名流,得益匪浅。因此,大千对张善孖敬畏有加,每当外出归来拜见二哥,行必大礼。直到晚年,大千还常对人讲:“我在绘画上有些成就,要感谢二哥兄的教导。”

其时的张善孖以画虎闻名,而与二哥的长期切磋合作也使大千对画虎的技法和造型了然于胸。但大千视兄弟之情高于一切,当他发现自己的才艺和声望渐渐超过二哥时,他就决心不再画虎。

1936年秋,大千畅游华山归来,与二哥张善孖对酌,待到酒酣耳热,大千已有七分醉意,想来多日未动画笔,蕴藉满怀的险峻奇绝无处抒写,不觉技痒,提笔就画了一幅中堂《虎啸图》。这幅画用笔恣肆放纵,满

苏有朋的两次放弃

1988年7月,台湾开丽唱片公司推出一档“电视新春争霸战”节目,由3位女生组成“小猫队”担任主持人助理,节目大受欢迎。于是有人便提出应加入3位男生助理才能使画面阴阳平衡,因此,开丽唱片公司贴出广告招聘3位男生。经过层层考核,“小虎队”诞生了。“小虎队”一上电视,就大受欢迎。他们演唱的歌曲也很快走红,于是,他们摇身一变成第一支由学生组成的少年组合乐队,短短数月便成为青少年的偶像。

那年,苏有朋15岁。人总会长大,是坚持“小虎队”的青春路线,还是有其他路可以走?如果坚持“小虎队”走下去的话,当然还可以继续再红几年,但几年后呢?

在人气正高之时,苏有朋选择了放弃。此后,他们开始各自的人生,有的上学,有的服兵役。而苏有朋,去了英国读书。“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我看到了大家对我的期望值与实际的我存在落差。”他说。

几年后,苏有朋学成归国。这时,有电视台向他抛出橄榄枝,邀请他去主持一些综艺节目。如果做主持人,在大家眼中,他依然是那个活泼的“乖乖虎”,他不愿意这样。他不断地问自己,这是我要的吗?

在那段迷茫的日子里,苏有朋最终选择了放弃,他拒绝了电视台的高薪聘请,而是执著地等待属于自己的机遇。

5个月后,《还珠格格》剧组招

募演员,他成功进入。《还珠格格》让苏有朋在内地拥有了一大批新观众,也为他的事业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由此他踏进了影视界。

转瞬即逝了10年,在这10年里,苏有朋主演了《情深深雨濛濛》《绝代双骄》《倚天屠龙记》《情定爱琴海》《杨门虎将》《刁蛮公主》等。他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在北京成立“苏有朋爱心基金会”,筹建希望小学,并出任“中国母亲援助行动”青年大使和“保护母亲河”爱心大使。

如今的苏有朋已经摆脱了“乖乖虎”的奶油气,经常以一个成熟男人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他举止优雅自然,说话大方得体。而这完全跟他的两次放弃有关。在火热的时候,他能够保持冷静;在失落的时候,他仍保持镇定。他不为荣誉和暂时的安逸诱惑,而是选择勇敢地放弃,反而拥有了更多。

摘自《可乐》